

后疫情时代红色文化在雄安公共设施中的表达

闫晓从¹, 张华¹, 齐志辉², 赵丹琳¹

(1.河北地质大学, 河北 050031; 2.河北美术学院, 河北 050700)

摘要: **目的** 弘扬红色文化的时代精神, 构建后疫情时代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模式。**方法** 以后疫情时代为背景, 以雄安红色文化为切入点, 借助两者之间的关联在公共设施的产品外观和功能设计上将其进行融合, 从而强化城市公共设施的文化表达, 深化用户对当代红色精神的理解及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正确认知。**结果** 得出红色文化的当代叙事性表达方法在城市公共设施中的应用策略, 并通过“红色文化融入造型和消杀功能设计、红色文化融入防疫情境设计、平疫结合的弹性设计和引导性设计”等雄安公共设施的设计模式来展开产品开发。**结论** 通过后疫情时代红色文化在雄安公共设施中的表达的研究和实践, 来将抗疫精神和红色文化进行设计融合, 从而在雄安新区构建“未来之城”的城市形象, 弘扬红色文化, 推动城市文明建设。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红色文化; 公共设施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1)22-0399-08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1.22.052

Expression of Red Culture in Xiong'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YAN Xiao-cong¹, ZHANG Hua¹, QI Zhi-hui², ZHAO Dan-lin¹

(1.Hebei GEO University, Hebei 050031, China; 2.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and Arts Studies,
Hebei GEO University, Hebei 05003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the time of red culture and developing the design mode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st-epidemic era and the red culture of Xiong'an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e appearance and function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with the help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and deepen us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red spirit and the correct cognition of sudden public health events. This paper figures out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contemporary narrative expression of red culture in urban public facilities. Through the design mode of Xiong'an public facilities, such as "red culture integrated into modeling and sterilization function design, red culture integrated into epidemic prevention situation design, flexible design of combining peacetime with epidemic time and guiding design", product development i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expression of red culture in Xiong'an public faciliti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the design integr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association of anti-epidemic spirit and red culture, and the city image of "future city" of Xiong'an New Area can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carry forward the red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city.

KEY WORDS: post-epidemic era; red culture; public facilities

一个城市的公共设施对城市文化和城市形象有着重要的影响。雄安新区作为建设中的新型城市,为

了符合长远发展的需求,其公共设施应尽可能完善。红色文化是雄安地区的代表文化之一,对雄安文化的

收稿日期: 2021-09-15

基金项目: 202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设计研究”(HB20YS030)

作者简介: 闫晓从(1979—),女,河北人,硕士,河北地质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文创设计。

形成影响深远,同时红色文化也可以作为城市公共设施文化表达的方式之一。受到从2019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城市公共设施作为全民共享的物质形态,在产品设计中的防疫需求不容忽视。有必要依据抗疫精神与红色精神的跨时代关联^[1],在城市公共设施的产品设计中寻求红色文化基因在后代疫情^[2]视角下的表达策略。

1 现有城市公共设施中存在的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公共设施是满足人们公共需求的设施^[3]。其涉及的产品范围很广,主要包括垃圾桶、路灯、标牌、公共候车亭、地铁站台、公共座椅、凉亭、公共卫生间、公共饮水装置等。

现阶段很多城市的公共设施在公共卫生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存在不足之处,如在人群密切接触型公共生活服务设施中,公共交通等候设施和游憩设施在这2方面的问题尤为重要。

1.1 现有方法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不足之处

在2019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城市公共设施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 配套功能方面的缺失。疫情的发生具有不可预判性。作为城市公共设施,使用者可能携带病毒细菌进入公共空间,同时也可能将存在于公共空间中的病毒细菌带走。这一过程缺少消毒杀菌环节,因此无法判断使用者是否沾染了公共设施内的病毒细菌。从新冠疫情的发展情况来看,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均存在较高的交叉感染风险^[4],而消毒杀菌能够降低这一风险,有效防止病毒传播。对于公共设施而言,被不同人所接触是其基本特性。但很多病毒细菌在不同的介质表面都有一定的存活期,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段接触和使用公共设施必然存在很大的交叉感染风险,因此消毒杀菌是疫情防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然而现阶段公共设施的消毒杀菌工作多以临时指定人员进行人工操作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不仅加重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也很难保证消杀频率和消杀效果。

2) 心理引导方面的空白。疫情导致人们的心理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恐惧、焦虑、不安等情绪会导致人们在公共环境中的行为模式产生相应改变。人们的行为会变得谨慎,但久而久之也会变得压抑、疲惫甚至消极。民众长期处于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压力下,很容易由于恐慌而引发抢购物资、暴力防疫等极端行为,不仅不利于防疫的总体布局,也会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因此,心理引导的重要性显

而易见。科学合理的心理疏导有助于人们对疫情引发的负面情绪进行排解,并可以引导人们采取理智、冷静的态度和科学有效的方法应对疫情中的人和事,使民众增强对集体力量和政府决策的信心^[5]。然而,目前的城市公共设施中普遍缺乏针对心理方面的有效引导。

1.2 文化表达方面的问题

1.2.1 中小城市中的公共设施千篇一律

在一些中小城市中,例如雄安周边的城市,其公共设施几乎千篇一律,既没有文化的表达,又没有当代时尚和科技的加入,缺乏设计感。在中国工业设计行业正在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6]的转变而努力奋斗的今天,这种与用户需求和环境需求脱节的产品显然是会被逐渐淘汰的。在已明确城市发展定位的雄安新区,更需要这些能够与城市面貌相协调的、具有前瞻性和文化内涵的公共设施在城市空间中发挥重要作用。

1.2.2 文化基因混乱

多数城市的公共设施在设计风格上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存在不明确或不成熟的问题,如“欧陆风”和“复古风”的风靡一时,即是设计向“文化”良性过渡的尝试。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融合了继承与更新、保留与创造,但其在一定的时空内又是相对稳定的。中国文化在当代的核心内容是红色文化,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而红色文化在不同地域则表现出了不同的叙事载体,同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具有地域特性的核心文化最能激起人们的文化认同,将其用于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中也有助于地域文化的表达、传播和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但是目前包括雄安新区原有县市在内的很多城市的公共设施不仅缺少对地域文化的表达,更没有固定的文化风格体现,见表1。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具有浓郁文化底蕴的城市中,其公共设施在产品外观风格上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而在开放性强、时尚前卫的大都市中,其公共设施在整体设计风格上比较现代、时尚,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代科技相结合,但地域本土文化并不突出。绝大部分城市的公共设施均欠缺有关疫情防控的相关设计。

2 在雄安新区公共设施中加入疫情防控设计要素的必要性

从调查结果可知,超过8成的人认为使用公共设施有交叉感染细菌病毒的风险。这说明在经历了大型公共卫生事件之后,民众对交叉感染的认知度有明显

表 1 国内外主要城市公共设施情况分析表
Tab.1 Analysis of public facilities in major c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所在城市	产品使用功能	文化基因表达	防疫功能	样本图片
北京	在具备基本使用功能的同时,部分新建项目投放的产品增加了智能化功能	文化表达在公共设施中的体现不到位	欠缺	
苏州(古城区)	具备基本使用功能,并能与环境建筑相协调,从而起到美化市容的作用	文化表达有比较明确的地域特色	欠缺	
南宁	仅具备基本使用功能	文化表达缺少明确的基调	欠缺	
韩国首尔	具备基本使用功能,并能与景观相协调,从而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	表现出明显的现代都市文化,但地域本土文化表达不足	欠缺	
石家庄	仅具备基本使用功能	风格不统一,地域文化表达不明显	欠缺	
雄安新区(在建区域)	具备基本使用功能并能与景观适当结合	文化表达缺少明确基调,并缺少与城市发展定位相协调的设计	欠缺	

提高,同时有将近 7 成的人在使用公共设施的前后有消毒或清洁的意识,且仅 4 成多的人有携带消杀产品外出的习惯。因此对于细菌病毒的消杀工作可能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实施,例如嫌麻烦或者没有随身携带消杀产品等。由此可见,在公共设施设置消杀服务有其必要性。第 4 项正验证了这一观点,有约 6 成的人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提供消杀服务,仅少部分人认

为可以回家后再进行消杀工作。

由以上统计结果反映出,在后疫情时代,雄安新区公共设施亟待解决以下问题:

1. 病毒细菌的快速传播带来交叉感染的隐患

国内城市的规划多为中心组团式布局,即围绕商业综合体分布多个住宅小区的形式,极易造成商业、消费、就业和居住人口的重叠聚集。一旦发生疫情,

表2 通过问卷星对1160个雄安新区相关人员进行了公共设施与疫情防控的相关调查。

Tab.2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facilities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1160 people in Xiong-an area (2020)

序号	选项	小计	比例
1	认为使用公共设施有交叉感染风险	985	84.91%
2	使用公共设施前后有消毒或清洁的意识	796	68.62%
3	有携带消毒或清洁产品外出的习惯	527	45.43%
4	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提供消杀服务	697	60.09%
5	认为公共设施应该有简易紧急医疗救助	463	39.91%
6	认为公共设施没必要设置防疫功能	76	6.55%
7	有效填写人次	1160	

病毒细菌会随着人群的聚集和流动迅速扩散,同时由于建筑布局的高密度特性,很容易因交叉感染造成大范围快速传播^[7],后果严重。

2. 消杀困难

疫情发生后,以社区为单位的疫情防控方式暴露出明显的消杀问题。城市规划中的集约化管理使得住宅区人口非常密集,生活配套设施也相对比较匮乏。比如社区内绿地广场的游乐设施、公共座椅、健身器材、电梯等,这些公共设施的人为消杀工作在实施频率上远远比不上其被使用的频率,因此很难避免交叉感染。即使是非住宅区的商业、文教等公共场所,在疫情未达到居家隔离的严重程度之前,也容易因为公共设施的消杀工作不到位而加重疫情发展。

3 将红色文化融入雄安新区公共设施设计的必要性

3.1 红色文化与抗疫精神的内在关联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人民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在抗疫斗争中,大量新时代的英雄涌现出来,他们之中有专家学者、有军人和战警、有默默无闻的一线医务人员、有各行各业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当然也包括了每一位具有抗疫大局观的民众。由革命年代的先烈们英勇奋斗、流血牺牲铸就的红色精神在抗疫斗争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8]。这些新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为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战斗精神,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的无私奉献精神,守望相助、众志成城的团结奋斗精神,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先锋气魄,以及精准防控、依法治理的科学理性精神。所有这些都是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红色精神在此次抗疫斗争中再次散发出新的光芒,红色基因在抗疫中也得到了良好的传承。

事实证明,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异常珍贵,红色

精神的强大动力能够帮助我们战胜困难、通过考验。因此有必要理清红色文化和抗疫精神的关联,借助城市公共设施载体,使红色精神融入人民的生活,并得到“活态”传承,进而使红色精神在城市空间中形成叙事性传播的方式。

3.2 雄安红色文化融入公共设施设计的必然需求

城市公共设施也被称为“城市家具”,是满足人们在城市公共环境中活动需求的用具,同时也是城市环境的重要构成元素和影响因素。城市公共设施不仅能够为城市服务还能影响城市的机能和形象气质^[9]。

每个城市在长期的发展中都会形成并表现出独特的文化,城市的历史越久远,文化底蕴就越浓厚。而且不同城市会由于发展历程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底蕴^[10]。雄安一带在历史上是一片革命圣地,雄安新区最突出的文化则是红色文化。雄安红色文化主要表现为以《荷花淀》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以“雁翎队”为代表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事迹^[11],以及以狼牙山五壮士为代表的英雄事迹等。雄安红色文化所表现出的是冀中平原特有的朴实、英勇、乐观和无私无畏的典型特征,这一特征与抗疫中所表现出的红色精神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同时也具有时代的差异性和传承性。将红色文化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相结合,即在生活中融入新时代的红色元素,使人们在红色文化的叙事空间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红色精神的传播与传承,进而形成雄安特有的城市文化气质。

综上所述,红色文化在抗疫精神和公共设施之间担负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因此以公共设施为载体,以红色基因作为媒介,使其成为后疫情时代抗疫精神的有效表达和传承方式。

4 后疫情时代雄安新区公共设施设计策略

在雄安新区的总体规划^[12]中以蓉城、安新两县交界区域为起步区,其位于新区北部,也是新区的主城区。起步区又分北城、中苑和南淀三个区域,分别依据地势和位置特征发展成为以高端服务、信息智能和军民融合产业为主的小城镇。功能空间由北往南基本划分为居住带、产业园和公园,而CBD商务区紧邻居住带和产业园,因此北部区域的建设基调以高科技和商业为主。

新区南部的建设主要是以现代农业、生态保护、生物科技、文化创意等产业为主的特色小城镇。功能空间上主要围绕白洋淀沿岸穿插分布着居住带和特色文化小镇,因此南部区域的建设基调以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为主。

根据以上规划情况,雄安新区的公共设施主要涉及四类功能空间,分别为居住带、商业区、城市公园和文化活动区域。未来十五年雄安新区制定了一系列

表 3 雄安新区规划主要指标 (部分)
Tab.3 Main planning indicators of Xiong'an
New Area (part)

分项	序号	指标	2035 年
绿色生态	1	蓝绿空间占比 (%)	≥70
	2	森林覆盖率 (%)	40
	3	耕地保护面积占新区总面积比例 (%)	18
	4	起步区城市绿化覆盖率 (%)	≥50
	5	起步区人均城市公园面积 (平方米)	≥20
	6	起步区公园 3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	100
	7	起步区骨干绿道总长度 (公里)	300
	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100
	9	城市生活垃圾回收资源利用率 (%)	> 45
幸福宜居	10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覆盖率 (%)	100
	11	人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筑面积 (平方米)	0.8
	12	人均公共体育用地面积 (平方米)	0.8
	13	起步区绿色交通出行比例 (%)	≥90
	14	起步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 (%)	≥80
	15	起步区公共交通站点服务半径 (米)	≤300
	16	起步区市政道路交通服务覆盖率	100
	17	人均应急避难场所面积 (平方米)	2-3

规划指标 (数据摘自“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 (2018-2035 年)”), 见表 3。

根据新区规划主要指标所示, 城市公园和公共交通的占比明显较大, 可见在未来雄安新区的公共交通和城市公园的公共设施将发挥重要作用。

从后疫情视角思考, 对红色文化融入公交候车亭、公园公共座椅、游乐设施等使用频率较高的公共设施中这一需求有以下设计策略。

4.1 红色元素融入公共设施的造型与消杀功能设计

从疫情防控的角度出发, 城市公共设施在产品功能上可以采用“加法”设计, 将消杀功能添加到产品的创新设计中。从文化表达的角度出发, 可以将雄安红色文化的物质元素以符号的形式融入产品造型和功能的设计中。如在公交候车亭的设计上, 整体造型融合了“雁翎队”中枪插雁翎的羽毛造型和雁翎船的木船造型, 在细节上巧妙运用了红色文学《小兵张嘎》中的“嘎子”形象, 见图 1。在功能上借助嘎子的形象提示和语音提醒完成消杀的这一交互方式, 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人们在使用候车亭和乘坐公交车时由于手的接触而引起的交叉感染风险, 还能够嘎子的微笑和鼓励中获得情感鼓励, 勇敢面对疫情。语音设置分为操作前与操作后两种, 分别为提示语音“上车前要消灭手上的敌人哦!”和鼓励语音“你真棒, 一定会打败敌人!”。这种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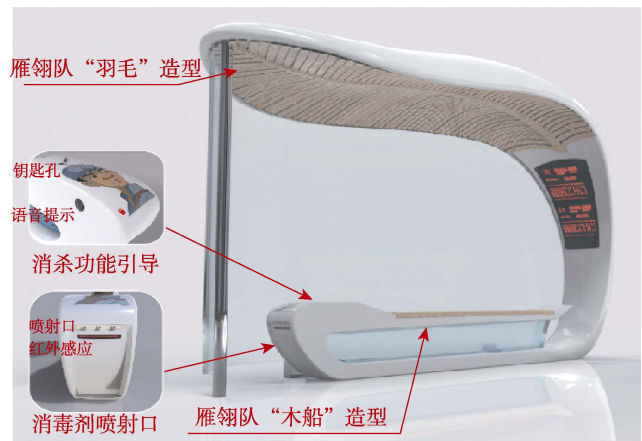


图 1 公交候车亭设计
Fig.1 Design of bus shelter

消杀功能的设计, 能够在传递红色文化的同时影响人们的行为和精神, 从而起到生理防疫和心理疏导的双重作用, 有助于提升疫情防控的成效。

4.2 红色元素融入公共设施的防疫情境设计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各抗日根据地就出现了以传统游戏为基础, 融入战争内容和抗战精神的儿童抗战游戏, 并流传至今。这些儿童抗战游戏就是依据儿童这一群体好动的天性,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13]。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中, 有很多看不见的“敌人”在威胁着人们的生活, 比如病毒、细菌、疾病等。抗击疫情的战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与抗疫有关的宣传教育也同样可以采用游戏的方式开展。

儿童游乐设施是现代城市游憩空间比较受欢迎的一类公共设施, 如滑梯、秋千、城堡等各种形式的产品。同时, 雄安新区及周边地域在战争年代也流传下着许多脍炙人口的有特色、有趣味的战争故事, 由此而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也不在少数, 其中著名电影“地道战”中展现了华北平原特有的游击战术, “荷花淀”中也描写了雁翎队凭借水上优势炮打运船的经典战法。将这些战斗故事与儿童游戏相结合, 把“敌人”定义为和平年代的“细菌病毒”, 从而创作出既迎合儿童喜好, 又能宣传教育红色精神和抗疫精神、寓教于游戏之中的情境式公共设施。如儿童城堡迷宫游戏跟地道战结合, 将疫情防护相关的细节以生动形象的互动设计^[14]嵌入到红五星造型的公共游乐设施中, 给用户提供一种在地道中与病毒斗争的游戏情境, 见图 2。考虑到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在内部细节设计中, 加入传声筒、隧道、滑梯等元素以增加互动性。同时通过加入抗疫有关的消杀引导、磁吸式抗毒游戏画板和病毒模型等设计, 来起到普及抗疫知识的作用。这些细节设计分布在迷宫的不同节点, 儿童需借助地面的图形指示来引导行进方向。在安全防护方面加入 LED 线型照明、滑梯扶手和软橡胶攀爬辅助等, 同时在空间尺度上也允许家长陪同, 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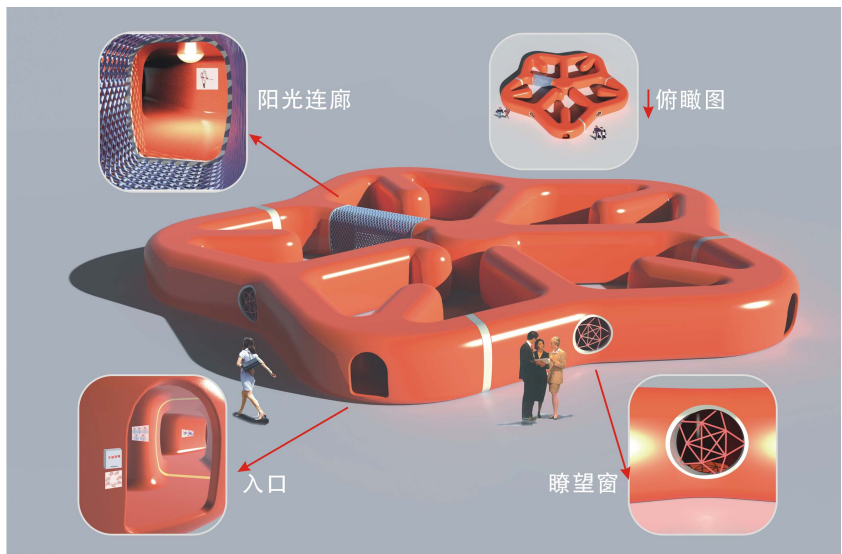


图2 “地道战”抗疫迷宫外观设计
Fig.2 Appearance design of “Tunnel War” anti-epidemic labyrinth



图3 “地道战”抗疫迷宫内部设计
Fig.3 Interior design of “Tunnel War” anti-epidemic labyrinth

进一步保障游玩的安全性，见图3。这种情景体验式设计能够使用户在游戏中学会有关疫情防护的知识和方法，同时也在无形中接受了红色文化的熏陶。另外，这种形式不仅适用于儿童，也可拓展到青少年甚至更多的群体。这种情境体验式设计是有情怀的设计，帮助用户从儿童时期开始培养健康、积极、乐观、自信、奉献的家国情怀。

4.3 平疫结合的弹性设计

现有的公共设施之所以无法有效地预防疫情发生或无法在疫情发生时有效地进行防控，主要是因为现有产品在设计初期未考虑到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爆发的情况。但是，疫情具有突发性特点，并不是常态，不能因为添加防疫相关功能而使现有产品的使用增

加不必要的障碍。因此，可以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方法，在保留产品原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增加消杀功能模块。在结构形式上可以采用隐性的设计，使增加的功能模块能够在不被使用的时候隐藏起来。这样既避免了附加功能模块对产品外观的影响，又能适当保护相关设备。比如，在公交候车亭的设计中将消杀模块隐藏在产品的侧面结构中，通过红外感应启动开关，从人机工程学角度上较为符合人的坐姿操作范围^[15]，可以满足用户在坐姿状态下使用的操作需求。再如公共座椅的设计，在造型上结合“雁翎船”的形态元素，并将消杀模块隐藏在座椅侧面，同样通过红外感应启动开关，使用户可以在从站到坐或从坐到站的姿态切换中使用此功能，同时也能够避免在坐姿状态下无意识触发开关的不便，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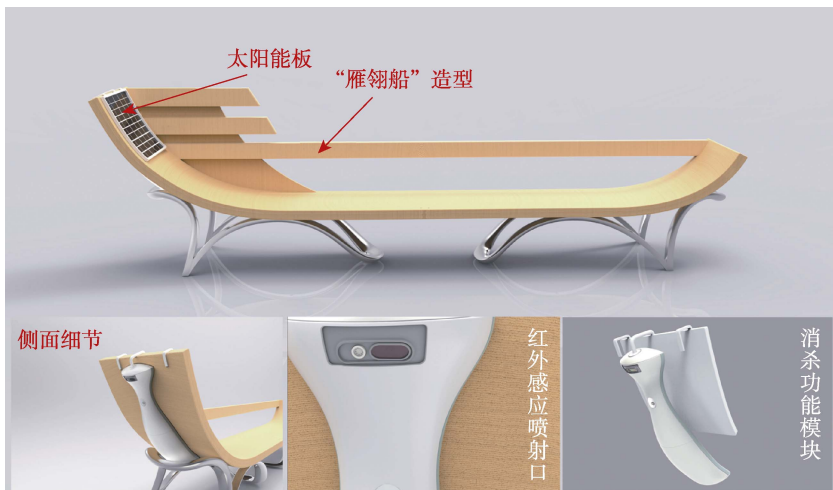


图 4 公共座椅设计
Fig.4 Design of public se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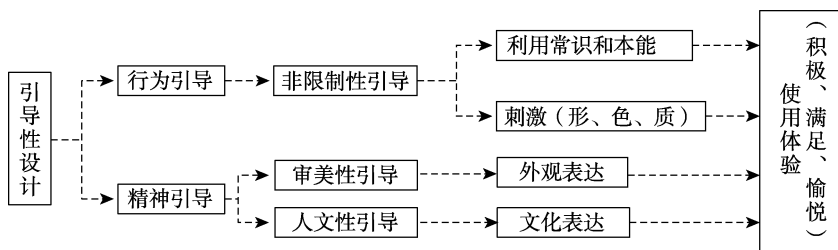


图 5 引导性设计分析图
Fig.5 Analysis chart of guiding design

同时，防疫相关模块与日常模块可以进行选择性组合或拆除，以便根据疫情的使用需求增加或减少功能模块，以及进行后期的维护升级，从而增加产品的可持续使用性。这一方式既可以达到对现有资源设计利用的最大化也可以实现使用成本的最小化。根据“平疫结合”的理念，在“平”时拆除或关闭疫情相关功能模块，在“疫”时则安装或开启疫情相关功能模块，既能做到“平疫结合”，也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正如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奉献精神——平时时期默默奉献，危急关头挺身而出。

4.4 雄安新区公共设施的引导性设计

公共设施的功能性设计和文化基因的表达若想很好地发挥其作用，还需要通过引导性设计来提升用户对设计的利用率，发挥设计的最大功效。

引导性设计主要包括行为引导和精神引导 2 方面内容，见图 5。

4.4.1 行为引导设计

行为引导有限制性和非限制性 2 类方法。基于人性化视角，不论是从用户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更倾向于采用非限制性的引导方法。

非限制性引导方法包括 2 种，第一种是利用人的常识性和本能性，将公共设施使用中的认知、学习难度和时间降到最低，使引导过程能被更多人所理解。

即以人的认知和感觉能力阈限的低值为参考标准，将用户年龄范围设置为 7~70 岁，并以满足这一范围内 95% 的人的需求来设置认知和行为阈限，必要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个可调节尺度的结构。使得城市公共设施的消杀功能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在满足需求的同时达到有效传播红色文化的目的。第二种是通过设计刺激来激发用户的主动思考与参与，从而引导用户行为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16]。形态、色彩、材质包括声音、画面等都可以被作为刺激性信息进行设计。如公交候车亭的消杀功能采用了语音提示的方式，对上车前已进行手部消毒的用户发出语音表扬，对未进行手部消毒的用户发出语音提醒。另外，视觉刺激的引导也是直观且有效的，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视觉形式的引导性设计中，能够利用好奇心引发人的注意并使用。

4.4.2 精神引导设计

精神引导设计主要包括审美性和人文性的文化引导。公共设施的审美引导不仅能通过产品本身的艺术性设计来提升民众的审美意识，还能借助产品之美塑造城市美景，使人们发现并感受到城市的美好，增强主人翁意识。人文性引导通过地域文化的表达唤醒人们对人文传统的记忆与认知，强化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通过人文关怀设计强化用户对“家”的温馨感受，促进社会和谐。对于雄安新区公共设施的精神引导要根据区域定位来确定审美基调，同时以红

色文化为地域文化的核心内容展开创意设计,使民众在排解负面情绪的同时,能够从红色文化所传递的红色精神中获取鼓励和信心,以良好的心态来面对疫情。

5 结语

城市公共设施既是市民日常生活的社交媒介又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载体。雄安新区作为未来城市建设的样本,其公共设施中的文化基因表达不可被忽视。红色文化作为雄安地域文化的代表性内容,要想进一步弘扬和发展新时代的精神内涵就需要与城市建设相融合。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启示,通过在公共设施造型上融入红色元素与功能、情境上增加防疫相关的设计,为红色基因和抗疫精神寻找共同的物质载体,并以此为当代红色文化的叙事性传播开辟新的途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民众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和战胜困难的心理素质。在设计策略中还要考虑功能的平疫结合以及对用户行为的恰当引导,实现成本的降低和使用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 [1] 崔健,舒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好伟大抗疫精神论略[J].思想教育研究,2021(2):116-120.
CUI Jian, SHU Lian. On the Great Anti Epidemic Spirit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J]. Studies in Ideological Education, 2021(2): 116-120.
- [2] 李丽华,全利,蔡晓艳.后疫情时期轨道交通站点设施设计的应对策略[J].包装工程,2020,41(18):313-317.
LI Li-hua, QUAN Li, CAI Xiao-yan. Strategies for the Design of Rail Transit Station Facilities During the Post-Epidemic Period[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18): 313-317.
- [3] 王杰,宗同惠.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研究[J].包装工程,2021,42(2):305-307.
WANG Jie, ZONG Tong-hui. Design of Urban Public Facilitie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1, 42(2): 305-307.
- [4] SARAH W, CHARLOTTE H, LESLEY O, et al. NICE Public Health Guidance Update[J].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20, 42(2): 41.
- [5] 徐永顺,周宇,刘渊,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居民情感需求挖掘[J].图书馆论坛,2021,41(9):76-86.
XU Yong-shun, ZHOU Yu, LIU Yuan, et al. Emotional Needs Mining of Residents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J]. Library Tribune, 2021, 41(9): 76-8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01124.0852.004.html>.
- [6] 蒋殿春,王小霞,李磊.“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基于劳动工资与技术创新的新思考[J].经济评论,2019(5):50-62.
JIANG Dian-chun, WANG Xiao-xia, LI Lei. “Made in China” to “Made in China”: New Thinking Based on Labor Wag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Economic Review, 2019(5): 50-62.
- [7] 骆宇,姚刚,段忠诚.疫情防控背景下社区公共卫生设施的改造策略研究—以江苏省泗阳县为例[J].中外建筑,2020(10):149-152.
Luo Yu, Yao Gang, Duan Zhong-cheng. Research on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Facilities Reno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Siyang, Jiangsu Province[J]. Chinese & Overseas Architecture, 2020(10): 149-152.
- [8] 孙洋.“抗疫中的红色精神—第二届讲好上海红色故事”视频学术会议综述[J].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4):64-65.
SUN Yang. “Red Spirit in Anti Epidemic: The Second Session Tells Shanghai Red Story Well” Summary of Video Conference[J]. Chinese & Overseas Architecture, 2020(4): 64-65.
- [9] 肖丽,熊炎,赵宏亚,等.红色文化在江西城市家具建构中的化归与呈现[J].包装工程,2019,40(24):337-344.
XIAO Li, XIONG Yan, ZHAO Hong-ya, et al. Re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Red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iangxi Urban Furnitur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24): 337-344.
- [10] 杨自强.城市文化导向下的公共设施设计[J].包装工程,2019,40(12):298-301.
YANG Zi-qiang. Design of Public Facilit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Urban Cultur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12): 298-301.
- [11] 王延松.重回白洋淀雁翎再飞扬—民族歌剧《雁翎队》导演阐述[J].戏剧文学,2020(11):34-36.
WANG Yan-song. Back to Baiyang Lake, Wild Goose Plumes Flying Again: Exposition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Opera “Yanling team”[J]. Drama Literature, 2020(11): 34-36.
- [12] 国务院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的批复[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2):26-29.
Reply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Master Plan of Xiong-an New Area in Hebei Province (2018-2035)[J]. Gazett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2): 26-29.
- [13] 王星慧.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儿童抗战游戏[J].河北学刊,2017,37(3):219-225.
WANG Xing-hui. Children's Anti Japanese War Games in the Anti Japanese Base Areas of North China[J]. Hebei Academic Journal, 2017, 37(3): 219-225.
- [14] 龚芸.互动设计在公共艺术介入乡村中的启示与研究[J].包装工程,2020,41(20):284-289.
GONG Yun. Enlightenment and Research of Interactive Design in Public Art Intervention in Countrysid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20): 284-289.
- [15] 郭北苑,张学莹,张玉乾,等.工程和设计中心人因工程学方法的适应性分析[J].包装工程,2021,42(4):22-33.
GUO Bei-yuan, ZHANG Xue-ying, ZHANG Yu-qian, et al. Adaptability Analysis of Ergonomics Method in Engineering and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1, 42(4): 22-33.
- [16] 张艳玲,罗婷.交互设计中的行为分析在社区公共设施的应用[J].包装工程,2021,42(4):256-262.
ZHANG Yan-ling, LUO Ting. Application of Behavioral Analysis in Interaction Design in Community Public Facilitie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1, 42(4): 256-262.